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研究 文 學 古 典

十六編 第 4 冊

六朝散體文論稿 (上)

王琳、楊朝蕾 著

花木蘭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六編

曾永義主編

第4冊

六朝散體文論稿(上)

王琳、楊朝蕾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六朝散體文論稿(上) / 王琳、楊朝蕾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民106〕

目 2+166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六編；第 4 冊)

ISBN 978-986-485-106-5 (精裝)

1. 六朝文學 2. 散文 3. 文學評論

820.8

106013417

ISBN-978-986-485-106-5



9 789864 851065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六編 第四冊

ISBN：978-986-485-106-5

六朝散體文論稿(上)

作 者 王 琳、楊朝蕾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7 年 9 月

全書字數 307696 字

定 價 十六編 8 冊 (精裝) 新台幣 15,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六朝散體文論稿(上)

王琳、楊朝蕾 著

作者簡介

王琳，生於內蒙古包頭市。曾先後就讀於湘潭大學、河南大學，1985年獲文學碩士學位。現為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古代文學教研室主任。兼任山東省古典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古代散文學會常務理事。主要從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文學教學與研究，兼及古代區域文化和歷史地理研究。出版論著有《西漢文章論稿》《六朝辭賦史》等。

楊朝蕾，山東青島人。文學博士。貴州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致力於漢唐文學、中國文體學、佛教文學與高校古代文學教育教學改革研究。出版學術專著《魏晉南北朝論體文通論》，發表學術論文50餘篇。主持和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項目3項、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2項。

提 要

本書探討的對象是六朝時期狹義的散文，即散體之文。歷來論者對六朝駢體之文關注較多，而對同期的散體文的研究則頗為薄弱。有鑒於此，我們撰寫本書，以期彌補以往研究之不足。我們認為，與先秦兩漢散文相比，六朝散體文的主要開拓和進步，表現在寫景紀遊功能大幅度拓展、抒情性空前強化、雜傳書寫多元發展、論辯文空前卓越等四個方面，因而全書緊密圍繞這四個專題展開論述。



目

次

上 冊

緒 論	1
一、六朝思想的多元與重文的社會風氣	1
二、魏晉文風演變基本態勢	6
三、南北朝文風演變基本態勢	12
四、建安作家在強化情采方面的示範意義	16
第一章 六朝散文寫景紀遊功能的拓展（上）	19
第一節 遊風的盛行與山水審美觀念的自覺	19
第二節 山水景物之文與情景交融文風	24
第三節 六朝地記的興盛及其文學性	31
第二章 六朝散文寫景紀遊功能的拓展（下）	47
第一節 集六朝地記之大成的奇書《水經注》	47
第二節 寺塔記之傑作《洛陽伽藍記》	53
第三節 域外行記之珍品《佛國記》及其他	57
第四節 六朝地記的影響及其評價	63
第三章 六朝散文抒情性的強化	75
第一節 六朝重情風尚	75
第二節 一往情深的哀祭文	79
第三節 情味彌濃的書牘文（上）	95
第四節 情味彌濃的書牘文（下）	114

第四章 六朝奏議文及其他	141
第一節 情理兼備的奏議文	141
第二節 形同抒情小品及蘊含創作觀念的序文	152
第三節 其他抒情性較強的文體略述	161
下 冊	
第五章 時代的影像：六朝雜傳——以齊魯籍作者 為例	167
第一節 亂世英雄傳	168
第二節 僧道傳、逸民傳、孝子傳	175
第三節 家傳、鄉賢傳、自傳	180
第四節 其他雜傳	190
第六章 六朝論體文名家及子書著述（上）	199
第一節 「論」壇鉅子嵇康	199
第二節 「才高詞贍」陸機	216
第三節 「辯覺法師」慧遠	227
第四節 「法中龍象」僧肇	245
第七章 六朝論體文名家及子書著述（下）	257
第一節 「一時文宗」袁宏	257
第二節 史論巨擘范曄	271
第三節 六朝子書撰作風貌的階段差異	288
第四節 晉代另類子書著述	301
結 語	319
參考文獻	325

緒論

在中國散文史上，魏晉南北朝是繼先秦兩漢之後又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其時散文的發展，既受到先秦兩漢散文的灌溉滋養，也是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思想文化演變的產物。受社會的動蕩、皇權的低落、意識形態的多元，士人思想與寫作活動較少受到限制干預，乃至作家生活空間的轉移等等因素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散文的表現功能得以拓展，在此背景下，寫景紀遊之文、抒情之文、論辯之文應運而興，佳作迭出，令人矚目，充分顯示了當時文壇的長足進步。

魏晉南北朝散文的發展，就社會大環境而言，基於當時意識形態領域的多元化態勢，以及彌漫士林的尚文風氣。魏晉文風，基本呈現樸素自然與華美文飾並存，而後者之發展勢頭漸趨顯著的態勢。南北朝時期駢體文流行，散體文的表現範圍受到前所未有的擠壓，但其在某些寫作領域仍然佔據著較為可觀的地盤，而且還產生了不少優秀作品。茲就有關問題予以概述。

一、六朝思想的多元與重文的社會風氣

與大一統的漢帝國不同，延續將近四個世紀的魏晉南北朝，除西晉滅吳後保持了 30 多年的統一局面外，其他的大部分時間處於分裂狀態。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交織一起，戰亂頻仍、殺伐不斷，再加上瘟疫、水旱等滅害的發生，整個社會陷入極其混亂和苦痛之中，「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虛，函夏蕭條」〔註 1〕之類記載屢屢見於文籍。在此

〔註 1〕〔唐〕房玄齡等：《晉書》，卷 56《孫綽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版，第 1545 頁。

形勢下，不僅廣大百姓深受其害，就連士大夫文人乃至王侯帝族也難免厄運。漢魏之際的軍閥混戰，大批文人遭受飄零之苦；魏晉之際曹氏與司馬氏的權力爭奪，大批文人被殺，造成「名士少有全者」的恐怖局面；晉宋時一系列的政治變故，也使不少文人死於非命。帝王公侯被篡、被鳩、被誅的事件亦數不勝數，就劉宋一代言，據清人汪中《補宋書宗室世系表序》統計，皇族 129 人，被殺者 121 人，其中骨肉自相屠害者達 80 人。於是，感歎世道艱難、人命危淺成爲瀰漫於全社會的典型音調。

伴隨著大一統政權的崩壞、社會的混亂而生的是儒家思想獨尊地位的低落和社會思想多元化的發展。漢武帝時代定儒術於一尊後，儒家學說在詮釋體系中日益神聖化、經典化，雜以讖緯迷信，流於荒唐虛妄。儒生們爲利祿所誘，往往拘守繁瑣章句。東漢後期，在日益嚴重的政治危機面前，儒家學說缺乏緩解這種危機的實踐功效，逐漸導致了人們對它的信仰危機。漢魏之際，在大一統政權業已崩潰的形勢下，人們紛紛向諸子學說中去尋求救世良方及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撐，於是，道、名、法、兵、縱橫等各家思想應運而起，乘勢復興，思想界呈現自春秋戰國以來又一次極其活躍的局面。曹丕《典論》所謂「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定檢，事無定價」。有的統治者對此局面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晉書·傅玄傳》引傅玄《舉清遠疏》所云：「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註 2），都是漢末魏初思想領域變化的真實概括。當然，所謂儒家思想地位的下降，是指它失去獨尊的勢頭，而並不意味著它被人遺忘或拋棄。在漢魏之際及整個六朝，儒學由其維繫綱常倫理教化之性質所決定，在社會思想及政治領域仍然具有重要地位，就連崇尚刑名之學的曹操，雖有時敢於公然發表背離儒家傳統的言論，但爲了壓制打擊政敵，他還要借助維護儒家禮法之名定其罪、誅其身。後來的司馬氏父子亦倡言「以孝治天下」，假竊禮法以售其奸。他們的這種虛偽行徑，對某些士人鄙薄儒學起了激化作用，如阮籍、嵇康公然蔑視禮法，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號。

在魏晉南北朝思想活躍的氣氛中，道家思想頗爲興盛。這與部分思想家試圖調整經學衰微後社會思想的紛雜，以適應重建封建統治格局的需要有一

〔註 2〕〔唐〕房玄齡等：《晉書》，卷 47《傅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版，第 1317～1318 頁。

定關聯，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廣大士人深切地感受到漢末魏晉政權更迭過程中對政敵之血腥屠戮的殘酷性，爲了擺脫災禍，安身立命，便轉向崇尚虛無、逍遙避世。曹魏正始年間，以老莊思想爲骨架、調和儒道的玄學興起，玄談風行，盛況一直綿延至東晉。南朝時玄談之風的隆盛程度雖遜於魏晉，但老莊思想仍被文人士大夫所普遍浸染。玄學作爲文人士大夫逃避現實的理論工具，固然產生了消極作用，但對於衝破漢儒讖緯神學和繁瑣章句之學，促進思想的解放也起了積極作用；至於玄談的自由辯論方式及崇尚抽象思維的風氣，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們的理論思辨水平。

佛教的興盛也是魏晉南北朝思想文化領域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佛教雖自漢代就傳入中國，但真正流行是在兩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在此時得以流行的重要原因，是其生死輪迴、善惡果報、超脫現實的說教適應處於亂世中的各個階層人們的精神需要。飽受禍殃的人民，爲忍受今生的苦難，修得來世的幸福，信佛是尋求安慰的一種途徑，正如劉宋何尚之所說：「五胡亂華已來，生民塗炭，冤橫死亡者不可勝數，其中誤獲蘇息，必釋教是賴。」〔註3〕至於上層統治階級推崇佛教，除希冀得到佛陀的蔭庇，解脫對動蕩不寧之現實的恐懼外，也可能有麻痹銷蝕人民的抗爭意識、維護既得利益的政治用意。此外，佛教的興盛也與儒道釋合流、漢譯佛典的繁榮及名僧高僧的湧現有直接的關係。

思想文化領域的活躍，對本時期文學觀念的自覺、文學創作繁榮局面的產生起到了顯著的促進作用。漢代統治者取士，率先經術，知識分子多將精力投於儒家經典的詮釋，以致不少人皓首窮經。本時期儒學失去獨尊地位，統治者取士亦由重經學轉向重文才。《宋書·臧燾傳論》云：「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家棄章句，人重異術」；劉勰《文心雕龍·時序》云：「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鍾嶸《詩品》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爲文棟；劉楨、王粲，其爲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這既說明漢魏之際部分士人的興趣從經學轉向文學的情況，同時也說明思想文化領域的熱點往往是隨著高層人物的愛好而轉

〔註3〕〔梁〕僧祐：《弘明集》，卷11《何令尚之答宋文皇帝贊佛教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頁。

移。這種風氣歷兩晉南北朝不衰而南朝尤盛，帝王挾其特殊身份招納文士成爲文壇的一個重要現象。規模較大的文學集團不斷出現，魏之三曹，宋之臨川王劉義慶，齊之竟陵王蕭子良，梁之昭明太子蕭統、簡文帝蕭綱、元帝蕭繹，陳之後主陳叔寶等，都是著名的領袖人物。其他如魏明帝曹叡、高貴鄉公曹髦，亦好文學；宋武帝劉裕、文帝劉義隆、孝武帝劉駿、明帝劉彧、南平王劉休、建平王劉弘、廬陵王劉義真、江夏王劉義恭、始興王劉濬、建平王劉景素等，皆好文學；齊高帝蕭道成、文惠太子蕭長懋、鄱陽王蕭鏘、江夏王蕭鋒、衡陽王蕭鈞、隨王蕭子隆等皆好文學；梁武帝蕭衍及宗室豫章王蕭綜、邵陵王蕭綸、武陵王蕭紀，後梁帝蕭詧、蕭巋，南康王蕭會理、尋陽王蕭大心、南郡王蕭大連、樂良王蕭大圓、長沙王蕭業、安成王蕭秀、南平王蕭偉、鄱陽王蕭範等皆好文學，善屬文。至於皇族以外的高門大族，更憑藉其世代相傳的文化積澱醉心於文學創作，以獲取社會聲譽，作爲引以自豪的資本，湧現出許多「世以文章顯，軒冕相襲」〔註4〕的文學家族。《梁書》卷三十三《王筠傳》載王筠寫給諸子的書信，述及他對王氏家族政治地位，尤其是文化傳統的自豪自信和對後代子孫以文化優勢傳家的期望：「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註5〕《梁書》卷三十三及《南史》卷二十二之《王筠傳》記述王筠事蹟，幾乎全以其文學創作活動組織而成，茲略引以窺一斑：「（筠）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甚美……尚書令沈約，當世辭宗，每見筠文，諮嗟吟詠，以爲不逮也……約於郊居宅造閣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題……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爲文能壓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美。約常從容啓高祖曰：『晚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奉敕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詞甚麗逸。又敕撰《中書表

〔註4〕〔唐〕房玄齡等：《晉書》，卷92《文苑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370頁。

〔註5〕〔唐〕姚思廉：《梁書》，卷33《王筠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486～487頁。

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敕爲哀策文，復見嗟賞……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
〔註6〕六朝社會尚文風氣之濃由此可見一斑。在全社會的尚文氣氛中，六朝士人普遍以能文相標榜，甚至某些武夫也在耳濡目染下紛紛倣效，以附庸風雅。南朝的史書，不僅開始專設《文苑傳》或《文學傳》，而且在其他傳記中觸處可見「善屬文」、「文采妙絕當時」之類評價，可見文學日益成爲一個獨立部門並成爲評價人物的重要標準。伴隨著創作繁榮的是各類文集編纂之風的興盛以及相關的理論批評的發達，《隋書·經籍志》著錄的此期書目足以讓人們歎爲觀止。

在此期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中，最引人注目的新氣象是對文學功能及文學審美特徵有了進一步的明確認識。漢代人論文，或受政教功利思想的束縛，片面強調諷諭教化作用。魏晉南北朝人對文學功能的認識，雖仍有沿襲漢代傳統觀念的，但畢竟沒有形成氣候；而許多人在創作中和理論批評中更重視的是文學吟詠個人感情，滿足自我精神需求的作用，因此他們寫得更多的是不包含政治意義，表現自己日常生活內容和情緒的作品。這種傾向的盛行，直接影響到此期文學題材的拓變，致使大量無關政治教化的寫景、詠物以及抒發離情別緒等情感的作品不斷湧現。與此相應，時人對文學本身的審美特徵也有了空前自覺的認識。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重視文學的抒情特徵，不僅視抒發情感爲文學創作的動因，更把抒情當作文學批評的主要標準。曹植《前錄自序》表白自己「雅好慷慨」之作；陸機《文賦》強烈反對爲文「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陸雲《與兄平原書》中稱贊的是「流深情至言」的篇章；鍾嶸《詩品》提倡「吟詠性情」，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批評「典正可採，酷不入情」；蕭繹《金樓子·立言》論文、筆之分，提出「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這都是時人重抒情之自覺觀念的代表聲音。二是重視文學語言風格的華美。從曹丕《典論·論文》、曹植《七啓序》、《前錄自序》自覺地流露這種意識開始，魏晉的作家和批評家，大都崇尚華美之文，他們在重視文學的抒情性的同時，對辭采、偶對、用典等藝術技巧的追求也日益講究，就駢體文最基本的特徵對偶言，其時作家已達到了很高的境界，故《文心雕龍·麗辭》有「魏晉

〔註6〕〔唐〕姚思廉：《梁書》，卷33《王筠傳》；〔唐〕李延壽：《南史》，卷23《王筠傳》。

群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釐」之評。南北朝人繼承並發展了魏晉的文學精神，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更加重視文學本身的審美特徵，在重視抒情性的同時，愈益刻意追求語言技巧，而尤以南朝後期為盛。劉勰《文心雕龍》數萬字全用駢體寫成，全書在主張「為情而造文」的前提下，設置不少篇章來論述對偶、聲韻、用典等問題，可見他對駢體作品的語言美是相當重視的。蕭統《文選》收錄作品重駢體。李昶《答徐陵書》盛讚徐陵駢文：「麗藻星鋪，雕文錦綉。風雲景物，義盡緣情……久已京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右之音，韻改河西之俗。」〔註7〕可以典型地說明這種傾向。總之，這是一個極其崇尚華麗文風的時代，從魏晉的曹氏父子到南朝的蕭氏父子，從建安諸子陳琳、王粲、太康雙璧潘岳、陸機到劉宋元嘉三大家謝靈運、顏延之、鮑照，再到永明的沈約、謝朓，再到徐陵、庾信，皆不同程度地推重豔麗之文。甚至如葛洪這樣的思想家也大聲倡導美文。

魏晉南北朝散文的發展既植根於這種社會文化環境中，便不可避免地留下時代的印跡。一是作品數量空前紛盛。就清人嚴可均所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來看，該書收羅唐代以前的單篇文章及一些子書的佚文，合741卷，其中魏晉南北朝部分就佔了518卷，可見當時文章之盛是前代無法比擬的。二是題材內容及體裁形式有很大拓展，譬如抒情性濃的作品增多，描寫山水景物的作品湧現，論題集中論辯性強的單篇論文興盛，雜傳大量產生。三是對文章外在形式美有了高度自覺的追求，這種傾向在魏晉漸成風氣，至南朝，以講究對偶為主要特色，兼及辭采、用典、聲律的駢體文達到鼎盛狀態。

二、魏晉文風演變基本態勢

魏晉文風，基本呈現樸素自然與華美文飾並存，而後者之發展勢頭漸趨顯著的態勢。

樸質自然文風的倡導者與實踐者首推曹操。建安時，他針對詞浮於意的華靡文風，提出為文「當指事而語」、「勿得浮華」的主張，並身體力行，帶頭寫作簡約嚴明、樸實無華之文。如《求賢令》：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

〔註7〕〔清〕嚴可均：《全後周文》，卷6，《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3913頁。

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註8〕

文辭簡括得體，而意達理暢。其《讓縣自明本志令》風格亦與此相似。曹操排斥華靡文風，與他革新政治、崇尚刑名之學的思想有關，更與他「為人佻易」、「體性自然」的尚通脫的個性有關。尚通脫的個性表現在為文上，便是不受陳套的束縛，無所顧忌，直抒胸臆，想寫的便寫出來，怎麼想就怎麼寫，摒棄浮華之辭。魯迅先生稱他為「改造文章的祖師」。

曹丕的部分散文，基本繼承了乃父的作風，以行文隨便活潑，語言簡潔明暢、樸素自然見長。

魏末的著名文人嵇康，也寫了一些頗具通脫自然風神的文章。其《與山巨源絕交書》表現自己拒絕司馬氏拉攏的不合作態度，師心使氣，放言無拘，不避俚俗，如「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而起耳」，「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等，無論寫生活細節，還是寫思想個性，都不加遮掩雕飾。

晉代王羲之、陶淵明文，亦屬通脫自然一派。羲之的書啓雜帖往往率意命筆，相當隨便，但意味雋永。陶淵明《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告子儼等疏》諸文，述事達情，沛然流之於心，殊不見雕飾痕，極真淳，極自然。

魏晉時期單篇文章以外的著述，不僅呈現空前興盛面貌，而且基本上是散體創作形式的天下。此期史部著述極其繁榮，類別之豐富，前所未有的，其中大量的正史、編年史、雜傳、雜史、地志等皆以散體形式寫成，且不乏文學性較濃的作品，如陳壽《三國志》、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常璩《華陽國志》、葛洪《西京雜記》、嵇康《高士傳》、管辰《管輅別傳》、王粲《漢末英雄記》、虞溥《江表傳》、葛洪《神仙傳》、釋法顯《佛國記》、袁山松《宜都山川記》、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等；某些作品，在我國撰述類別發展史上，可以認為是具有開創性的，如釋法顯《佛國記》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域外行記，常璩《華陽國志》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方志，袁山松《宜都山川記》

〔註8〕〔清〕嚴可均：《全三國文》，卷2，《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1063頁。

是第一部重點記述自然景物的地記，王粲《漢末英雄記》是第一部專門為「英雄」寫得傳記，管辰《管輅別傳》是現存首篇記述詳細的家族人物傳記，嵇康《高士傳》是現存第一部專門的「高士」傳記，袁宏《後漢紀》中「史論」分量之重為歷史著作前所未有，等等，不一而足。魏晉是繼春秋戰國之後我國歷史上又一次思想領域極為解放的時期，故大量子部著述應運而生，與史部著述同輝，亦呈現相當繁榮的景象，有關作品，瀏覽《隋書·經籍志》著錄的名單，即令人歎為觀止，其中不少著述富有文學價值。

但是，自漢代以來，由於辭賦的盛行，一些文章受其影響，已呈現向整齊華麗方向發展的趨勢。這種情況在那些既是辭賦家又是散文家的創作中表現得尤其顯著。辭賦「鋪采摛文」的功能，一則決定了自身藝術追求華麗美觀的流向，再則推動了詩、文等相鄰文體向形式美的邁進。這早在六朝時期就引起人們的注意。譬如劉勰《文心雕龍·麗辭》專門論述對偶問題，先提出「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註9〕的基本觀點；接著說《尚書》、《周易·繫辭》、《詩經》等已偶用駢語，其性質屬於率然成對，並非有意經營；而後，他認為自覺追求對偶是從漢賦作家開始的：「自揚（雄）、馬（司馬相如）、張（衡）、蔡（邕），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註10〕」《文心雕龍·事類》論述用典問題，以為大量用典的也是漢賦作家：「劉歆《遂初賦》，歷敘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駟）、班（固）、張（衡）、蔡（邕），遂摭摭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註11〕」至於鋪飾華美的辭藻，更是漢賦的看家本領，司馬遷所謂「靡麗多誇」，揚雄所謂「辭人之賦麗以淫」，劉勰所謂「繁類以成豔」、「詞必巧麗」、「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鄒陽的《獄中上梁王書》、枚乘的《諫吳王書》、司馬相如的《封禪文》、王褒的《聖主得賢臣頌》、揚雄的《劇秦美新》、班固的《封燕然山銘並序》、蔡邕的《薦皇甫規表》、《郭有道林宗碑》等，都是善於鋪排文辭，駢儷化色彩很濃的作品。以至於一些不以賦著稱的文人的作品亦受其浸染，寫下整飭華美之作。到了魏晉時期，由於文學觀念的空前自覺，對文學形式美的追求更臻於一個新的階段，講究

〔註9〕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588頁。

〔註10〕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588頁。

〔註11〕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615頁。

駢儷、藻采、用典的風氣已成為一股不可遏止的潮流，除史書及學術著作外，其他文體都不同程度地向這一方向發展。具體而言，魏晉文駢化華美之跡最深的仍是辭賦，其次是章表等公文及朋友間來往的書信，而且呈現凡辭賦大家其文必華靡整飭過人的態勢。

魏文之講究形式美的代表作家是「建安之傑」曹植。曹植論文，相當注重文辭的華美，他本人的作品自也華美超群，陳琳稱其賦「清辭妙句，焱絕煥炳」（《答東阿王箋》），吳質稱其書信「文采巨麗」（《答東阿王書》）。其所作《洛神賦》、《七啓》，詞采豔麗，句式趨整，已為定評；文亦大體如是，如《與楊德祖書》描述漢魏之際文士雲起之盛況：

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註12〕

《與吳季重書》寫宴會情景：

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註13〕

《求自試表》抒發懷才不遇的壓抑憤慨情緒，則多用典故形成偶對：

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倣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註14〕

其他如孔融《薦禰衡表》、王粲《為劉荊州與袁尚書》、吳質《與東阿王書》等文，都有講究辭采、句式整飭、用典豐富的傾向。而且，建安文往往能把美的形式與充實的內容有機地鎔鑄一體，從而增進了感情氣勢的表現，具有「氣揚采飛」的鮮明特點。曹植之作，「骨氣奇高，辭采華茂」。陳琳之

〔註12〕〔清〕嚴可均《全三國文》，卷16，《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1140頁。

〔註13〕〔清〕嚴可均《全三國文》，卷16，《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1141頁。

〔註14〕〔清〕嚴可均《全三國文》，卷15，《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1135～1136頁。

《爲袁紹檄豫州》，聲討曹操罪狀，宣揚袁紹軍威，在排比整煉的句式貫之以磅礴的氣勢，如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頗能震撼人心，史載「琳作書及檄，草成呈太祖（曹操）。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註15）

曹魏中後期，各種文體皆有一些作品加速向形式美的方向發展，應璩、伏羲等的書牘文尤其講究辭采之美、對偶之工，皆爲在形式美的追逐方面頗有代表性的作家。甚至某些長於學術義理闡發的思想家，如魏晉玄學理論探討的著名人物王弼，也講究修飾文采，精於撰作駢儷之文，東晉孫盛《魏氏春秋》「王弼注易」條，已指出王弼注釋類撰述講究文采的傾向，稱其「敘浮義則麗辭溢目」。嵇康、阮籍個性通脫任真，其文在思想上少拘束，勇於傾吐時人所不敢說的言論。至於在藝術表現上，爲了陳理盡意，加強氣勢，也往往採用大致整齊且音韻和暢的排比句。阮籍《大人先生傳》、《達莊論》駢散相間，多用韻語，賦化傾向濃重；《答伏羲書》純用駢儷句式，文飾之跡則更爲明顯。嵇康文也有向齊整化發展的趨勢，如《答難養生論》描述理想的精神境界：「順天和以自然，以道德爲師友，玩陰陽之變化，得長生之永久，任自然以託身，並天地而不朽」，句式整齊且用韻，顯係受到辭賦的影響。由此可見，像嵇、阮這樣思想上不受時俗所羈的文人，散文的表現形式也基本透露由質趨文的大致軌跡。孫楚《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撰於曹魏末期，多用整煉的語句以鋪張渲染，文筆顯然在向辭賦作風靠攏，故清人何焯評云：「自是大才，不減孔璋，其源出於辭賦，故雅麗過之。」（註16）西晉之文，從總體上說，風骨之剛健，氣勢之充沛，比不上建安，也遜色於正始，但對辭采等形式美的重視則過之，所謂「采縛於正始，力柔於建安」、「結藻清英，流韻綺靡」、「緝旨星稠，繁文綺合」。這種文風的代表人物是陸機。他所撰《文賦》，系統地論述文學創作過程中的一些重要問題，以爲文章的體貌風格豐富多變，但亦有共同的審美要求，即立意構思應該巧妙，文辭應該妍麗，還應該有聲音之美：「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尙巧，其遣言也貴妍。暨聲音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並指出要從故籍中提煉鮮美的語言：「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其《演連珠》、《豪士賦序》、《弔魏武帝文》、《謝

〔註15〕〔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21《王衛二劉傳傳》裴松之注引《典略》，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601頁。

〔註16〕〔清〕何焯著，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958頁。